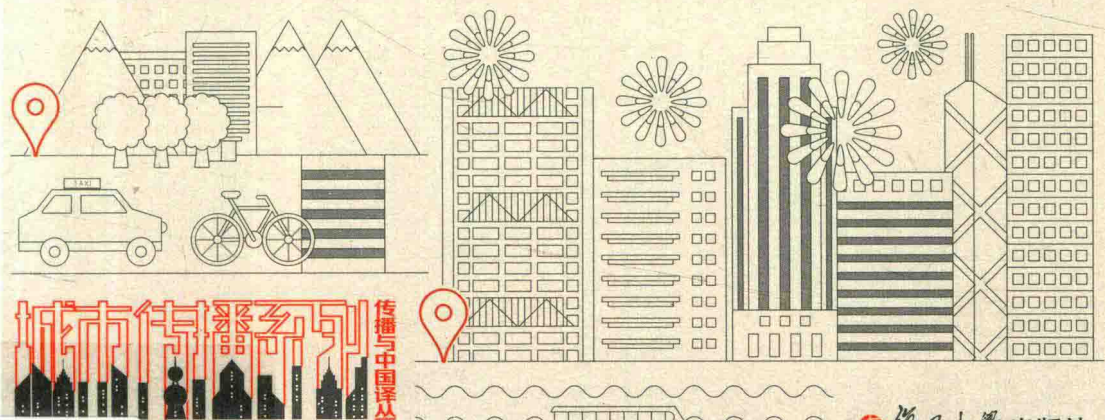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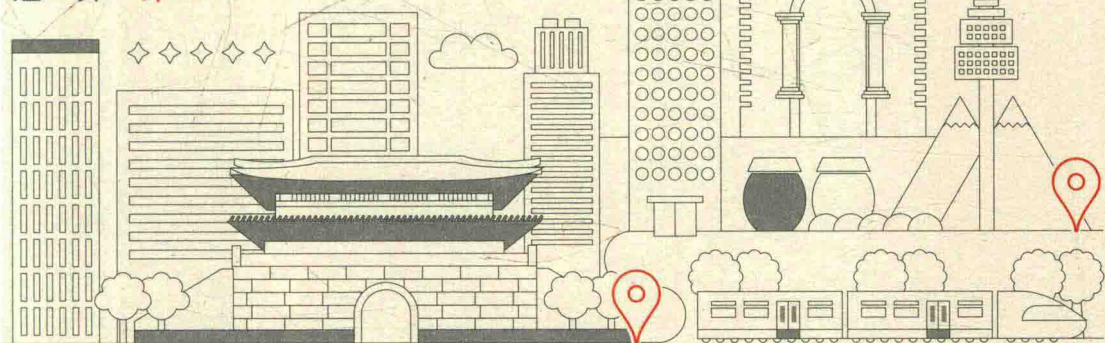


地理媒介： 网络化城市与 公共空间的未来

Geomedia: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澳]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 著

潘 霁 译



孙 玮

复旦大学出版社

地理媒介： 网络化城市与 公共空间的未来

Geomedia: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澳]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 著

潘 霁 译



丛书主编 孙 玮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澳)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著;潘霁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5

(传播与中国译丛·城市传播系列)

书名原文: Geomedia: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ISBN 978-7-309-14259-4

I. ①地... II. ①斯...②潘... III. ①互联网络-应用-城市空间-公共空间-空间规划-研究
IV. ①TU984.1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6852号

Copyright © Scott McQuire 2016

First published in 2016 by Polity Press.

The right of Scott McQuire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K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copyright ©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7-174

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

[澳]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 著 潘霁 译

责任编辑/朱安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79 千

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4259-4/T·644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城市传播研究”（批准号：15AXW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丛书序

孙 玮*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皇皇巨著《知识社会史》描述了自1450年以来西方知识界全景。在知识地理学部分,他写道:“在某些情形下,某一特定的城市催生了特定的学科,或者某学科中特定的分支。19世纪末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兴起。”^①想来传播学学者们看到这一段是既兴奋又沮丧的。一方面,伯克在知识史长河当中突出了帕克的思想,无疑是对传播学知识生产的一种特别关注。另一方面,和许多知识史研究一样,帕克的芝加哥学派被归于社会学,传播学并未以建制化的面貌在彼时出现。伯克在这个议题中指出了城市、交流与知识生产之关系,“城市催生了特定形态知识社群的出现。城市中聚集了足够多形形色色的人,在书店、咖啡馆和小酒吧里,同好们分享信息、交换观点,近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都大大受益于这些交流”^②。这个观点指出了传播学知识生产与城市的重要关系,但惜乎并没有在传播研究领域引起特别的反响。到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的历史进入了伯克称之为“知识的技术化”的时代^③。计算机、网络彻底改变了人类知识的基本状态。

借助巨人的肩膀回望历史,我们看到,新技术、城市化、全球化的汹涌大潮将传播研究推向一个“紧要关头”,传播学知识生产面临巨大的挑战与机

* 孙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汪一帆、赵博图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② 同上书,第213页。

③ 同上书,第296页。

遇。我们盼望像帕克、沃斯、伯吉斯的传播思想先哲那样，扎根城市发展的本土化经验，拓展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正是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提出城市传播的初衷与宗旨。传播与中国译丛·城市传播系列也是这个总目标之下的一个举措。2011年早春时节在苏州金鸡湖畔的茶馆里，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的同仁们啜饮着碧螺春，商议着中心未来的研究规划。大家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当前传播实践与中国社会之发展变化，试图寻找既能够凝聚大家的研究方向，又能突破现有新闻传播学研究框架的理论焦点。渐渐地，“城市传播”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浮现出来，莫名的兴奋感瞬间击中了在座的每一位。2011年仲秋在宁波大学静谧辽阔的校园，我们邀请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旧友新朋，拿出我们简陋但充满想象的城市传播研究设想，开了一个天马行空的论证会，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肯定。就这样，城市传播成为中心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词。如果我们将之理解为中心发展史上的一个事件，那我们就要问齐泽克关于事件的著名的问题，“事件究竟是世界向我们呈现方式的变化，还是世界自身的转变”^①。

齐泽克回答说：“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②自2011年“城市传播”成为中心的聚焦点，渐渐地，我们看待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方式变了。传播、媒介、城市、技术、新闻，这一个个我们以为烂熟于心的概念日益显露出前所未见的五彩斑斓。六年过去，中心围绕城市传播展开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基本轮廓，其间不断得到一些海内外同道的回响，渐渐地显露出崭新气象。城市传播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跨学科、以媒介为尺度、视传播为存在之基本要素，紧紧围绕着城市与传播这两个关键词，试图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城市研究中，汇聚传播的基本视角与议题，呈现传播研究的独特价值。段义孚在建构人文地理学派时说，“正如生命本身一样，思想的生命也是持续不断的”^③。城市传播研究抱持的学术企图，是在新技术狂飙突进的当前，回应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反思传播学的视阈边

^① 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界,进行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这也正是传播与中国译丛·城市传播系列的宗旨与目标。传播与中国译丛·城市传播系列书目的选择,是围绕上述想法展开的:从跨学科的视角,关注不同学科城市研究中涉及传播的核心议题,特别突出新技术对于城市及传播的前沿性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拓展对于传播、城市、媒介、新闻、技术的理解。

“传媒本来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在光的传媒中看,我们在声音的传媒中听,我们在语言的传媒中交往,我们在货币的传媒中交易。”^①如今,传播与媒介突然变成了照耀人类的一道新曙光。三五年前新闻传播界还在感叹大众媒介遭遇新媒体的挑战、大量专业人才流失等等本行业危机的问题,好像只是倏忽一瞬间,“人工智能”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横扫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新传播技术正在把人变成最终的媒介,这不是一个行业的变革,而是人类与世界的连接迈进一个崭新阶段。身处卡斯特描绘的网络时代的“都市星球”,我们期盼以“城市传播”呼唤更多的学术同道,给予这个时代一个有力的响应。

^① 马丁·塞尔:《实在的传媒和传媒的实在》,选自西皮尔·克莱默尔:《传媒、计算机、实在性》,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中文版序

我很乐意给《地理媒介》一书的中文版作序。

在研究和书稿撰写过程中,我一共来了中国七次,多数是来上海。我和上海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我自己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的媒介融合与数字文化研讨课程中也有幸认识了不少来自中国的年轻学子。我虽然对中国所知有限,但与中国同事和中国学生的交往也教育了我。我得以第一手地了解到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并且更清楚地认识到我自己研究的话题在中国也能引起强烈的共鸣。当代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城市化进程最为全面和迅速的所在。同时,中国现下有不少数字平台无论规模还是地位都能够与美国公司在网络搜索(百度)、社交媒体(腾讯)和电子商务(阿里巴巴)等领域一争高下。

接下来,我将“地理媒介”概念描述为在现代城市中与不同媒介平台的空间化过程紧密相关的新技术条件。地理媒介提高了媒介设备和各种服务改变人们空间体验的能力。作为这些命题的基础,我认为媒介与城市社会空间之间出现了新的结构性耦合。比起十年前我第一次提出此观点时^①,现在已经有更多的人开始逐渐接受这种耦合。但对于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却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

随后,我提出数字媒介平台与具体城市空间关联起来究竟结果如何要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其中包括许多相对来说更为“本地化”的影响因素。我在本书探讨中涉及不少案例的经验材料都来自在澳大利亚进行的研究。但是考虑到我是在与世界各地学者的交流过程中形成了这些思想,很显然其中有些过程、动力和情形的发展已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和文化差异。这自然不是说发展过程、结果和对此的体验将千篇一律。政治体系、政体环境、历史和文化实践等方面的差异都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对城市媒介平台的

^① McQuire, S., *The Media City: Media,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pace*, London: Sage/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8.

采用和随后的重构与调整,其中包括地图应用、移动数字装备、城市屏幕和大规模媒介艺术作品等。尽管如此,本书旨在揭示一系列能将地理媒介作为一种新条件加以定义的共同特点和趋势。数字媒介不再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地理物质属性针锋相对。相反,数字媒介成了现代城市“空间制造”实践和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现代媒介平台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改变了公共集会面临的传统局限,也影响了在城市中发生偶遇和交往的复杂动态。但这并非仅仅增强了市民的主体性,这些变化同时也在城市场景中带来了新的力量、新的节奏、新的规模比例和情感体验。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状况,我们需要从包括媒介研究和城市研究在内的各种学术传统中借鉴研究方法,并借此超越原有的传统方法。这也意味着需要更为关注媒介平台如何通过它们具体的界面和信息(传播)规则来塑造城市公共交往。最后一点强调了数据在新的城市媒介环境中的重要性。对数据的获取和控制成为21世纪城市生活中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斗争的最前线。

在本书中,我还提出网络化公共空间是我们通过体验来学习如何与多样化的他者建立关系的重要领域,这种关系构成了现代城市社会生活。由于媒介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我认为列斐伏尔提出的“对城市的权利”需要与时俱进地变为“对网络化城市的权利”。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具体挑战可能与澳大利亚(欧洲、非洲或美洲)都截然不同。但现代社会对中介(media)和直接(immediacy)关系的反思构成了全球化不平等条件的重要维度,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需要对此作出回应。

最后,我个人感谢潘霁博士翻译我的著作。从学术层面在不同文化实践之间的转译对于形成对话、帮助人们就共同面对的问题达成共识至关重要。全球环境资源短缺,需要我们发展出更具可持续性并更为公平的方式在城市中共同生活。而城市本身的意义却已经在此过程中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并不能成为沉沦于悲观主义的理由,相反,这是人们当下采取行动的号角。我们如今商议实施的各种决策、环境设置和行动计划都会对城市生活产生长远的影响。这从根本上意味着完成向数字城市和网络化公共空间的转型是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的责任。我谨希望本书可以为这一转型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斯科特·麦夸尔

2017年10月

译者序

地理媒介、生活实验艺术与市民对城市的权利*

潘 霁

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社会最为常见的主流生活形态。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市民经由城市生活的日常实践越来越紧密地将不断涌现的传播媒介技术、城市的地理建筑等空间元素以及城市本地的文化历史积淀按不同城市的特有逻辑勾连起来。媒介与城市生活经由日常实践的融合不断创造出城市新的交往时空。媒介化的城市交往时空重新设定了市民与自我、与多元他者,以及与外在世界共处的方式。而市民作为“城市人”的存在恰恰取决于市民与差异性的共处。正是在探索网络时代的市民如何作为“城市人”而存在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人们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积极主张并努力实现自己作为居住者(inhabitant)对城市的权利^①。

然而,新技术条件下居住者对城市的权利的内涵或实现路径都发生了根本转变。媒介与城市地理空间融为一体:媒介技术创造的虚拟的“公共空间”与广场、街道、公园和建筑等实体的城市地理空间合二为一。融入地理成为城市实体环境的媒介技术不再仅作为真实的“再现”或者中立的“传输手段”而从属于“现实”。城市地理空间中大量原本的“直接经验”与技术中介化过程紧密融合后抹淡了“中介经验”与“直接经验”之间原有的界线。媒介技术的大量涌现“超越了距离、从属性和缺席”^②。二元间界线的重构

* 本文原刊于《新闻记者》2017年第11期。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城市传播研究”(批准号:15AXW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Lefebvre, Henri,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Kofman & E. Lebas (eds.),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1996.

② McQuire, Scott, *Geomedia: Networked City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从根基上颠覆了经典传播研究背后的“再现论”预设。在新的媒介条件（即新的城市）中，以在场-缺席或中介-直接等二元对立结构为基础的媒介理论应怎样从技术环境变化出发重建自身根基？市民对城市的权利面临着怎样的机遇？数字技术与城市地理的融合过程涌现出哪些悖论？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讨论媒介与城市的关系？传播技术的发展如何才可以为市民实现对城市的权利开辟新的可能？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近推出传播与中国译丛·城市传播系列第一部，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所著的《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从“地理媒介”概念入手，整合多学科资源对传播学理论作了彻底的反思重构。麦夸尔的著作从理论上激发读者对传统媒体研究背后的“再现论”范式作创造性批判。作者阐明了数字媒介在促进城市公共生活方面的种种悖论，并通过在不同城市空间的现场实验探索了地理媒介支持的交往在“重造公共空间”方面的可能性。问题与多重可能性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城市传播研究的关键^①。对问题—可能性的整体叙事和分析充分体现了麦夸尔教授理论上的创新和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应然立场。本文从麦夸尔对媒介与城市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对技术可能性的讨论和整书结构等侧面入手，希望对此书的意义和局限有较为中肯的评述。

问题：媒介与城市公共生活的堕落

麦夸尔教授的《地理媒介》全书提问的基点作者体察到媒介技术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的剧变给城市公共生活及媒介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本身彰显了作者基于对在“在场-缺席二元对立结构的反思重新理解媒介技术和即时性的理论意图，阐明了作者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智慧城市”理念及其背后的技术观念的深刻批判，而发问方式也预示了问题的答案对于

^① 多琳·马西、约翰·艾伦、史蒂夫·派尔：《城市世界》，杨聪婷等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城市公共生活的未来具有指向性意义。

数字网络媒介与城市地理元素全面的深度融合将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转化为“地理媒介”^①。“地理媒介”深刻地改变了城市和媒介的结合以及二者对于公共生活的含义。诸多新的城市交往实践迅速涌现。技术与技术实践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城市文明理解技术的速度。技术与(技术)文明在发展速度上的失调导致城市公共生活的全面堕落和现代文明的退化^②。这种堕落和退化既表现在个人层面,也影响城市生活整体的生命力。从个人角度,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指出,“(在数字网络环境中)个人的物化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个人不得不为自己更好地参与数字环境或响应数字化的速度而重新认识自我”^③。自我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的“物化”在城市中创造出诸多碎片式的差异并“打开”了更多炫人耳目的新奇体验。城市中被传播技术(程序算法)“黑匣子”驱动的喧嚣忙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繁忙纷乱的城市网络矩阵中,个人即兴的破坏性创造和人与人之间“心有灵犀”的偶遇却愈发难觅。市民个人存在的意义或湮灭在日常每个离散时刻的繁忙乏味,无迹可寻。与碌碌无为如影随形的是城市市民个人生活激情和创造活力的衰退。除此以外,城市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间传统边界急速的重构也产生了双重后果:诸多原隐于城市“后台”的交往实践获得了“可见性”,而城市对“缺席”的象征性“召唤”也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将大量“新奇诡异”的体验带入市民生活:既可激发市民实验性的探索精神,也带来了存在意义上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④。城市乏味的喧嚣和无处躲避的“焦虑”笼罩了个人日常生活——个人的堕落和生命的退化迫在眉睫。

从城市整体看,作为城市精神生命力源泉的玩乐精神(play)和公共参与过程在超工业化逻辑的支配下也发生了关键转变。按斯蒂格勒

① McQuire, Scott, *Geomedia: Networked City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② 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③ Crary, J.,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 of Sleep*,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④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Stiegler)所言,这种转变令城市生活所有方面都有可能被作为经济生产的基本元素重新安排^①。这种安排秩序中,城市本地的历史文化符号、数字网络媒介技术和城市地理空间的意义都缩减为被资本权力利用以提高监测控制效率、增加信息传输精准程度的手段和工具。想象媒介技术和规划城市生活的方式也多被精确度、覆盖面、速度和效率等概念主导:空白、模糊和迟延成了媒介技术和城市规划要克服的障碍。遵循数字网络时代超工业主义的逻辑,7天24小时全面无遗漏的实时监测,完整到每个细节的规划设计,基于理性计算预测规避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对市民主体自发性的无视成了城市规划实践背后常见的理念和意识形态^②。一旦这种工业化的技术安排被奉为理所当然,人与技术、人与他者、市民与城市间原本存在的诸多其他可能性皆被遮蔽起来。城市的生命力因此枯竭。在城市本身遭到破坏的同时,如何面对城市社会激增的复杂性和不断涌现的差异性却变得愈发举足轻重^③。

麦夸尔教授指出,目前甚为流行的“智慧城市”话语即超工业化安排的代表。以“智慧城市”为典型的城市规划话语实践了关于控制城市的幻想,却忽视了城市生活本身具有的复杂性。智慧城市能通过多种数字网络不断地提供城市中人、财、物流动的数据^④。对城市生活主要方面实时全面的数据化带来不间断的全面追踪、不断增强的监测管控以及对未来更强大的预测能力。为此目的,智慧城市规划需利用数字网络技术管理规训并刻意消除城市公共生活中的不完整性、不确定性和市民生活实践中自发的主体性——那些成了“智慧城市”想象中给管理者造成不便的“噪声”。“智慧城市”建设背后的观念压制了关于城市未来可选项的有益对话。雷姆·库哈

^① Stiegler, Bernard, *The Decadence of Industrial Democracies. Vol. 1: Disbelief and Discredit*, trans. D. Ross and S. Arnold, Cambridge: Polity, 2011.

^② Townsend, A., *Smart Cities: Big Data, Civic Hackers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Utopia*, New York: Norton, 2013.

^③ Lefebvre, Henri,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Kofman & E. Lebas (eds.),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1996, p.129.

^④ Batty, M., Axhausen, K. W., Giannotti, F., Pozdnoukhov, A., Bazzani, A., Wachowicz, M., Quzounis, G., & Portugali, Y.,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Special Topics*, 2012, 214, pp.481–518.

斯 (Rem Koolhaas) 认为,智慧城市观念的流行恰恰表征了对现代城市想象的贫乏^①。萨森 (Sassen) 认为,智慧城市的计划过多地将数字技术用作增强中心控制和管理的工具^②。城市变得越“智慧”,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却可能对自己越不满,并丧失对集体未来的信仰。麦夸尔教授在书中更是认为,市民对自我的不满和信仰的丧失反过来又加剧从众心理,形成了城市公共生活不断堕落的恶性循环。而全书提问的出发点就是“地理媒介”作为新的媒介形态能否有效地打破这种可能带来城市公共生活全面堕落和文明退化的恶性循环。全球网络化时代,无论是提出问题或对问题的回答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人类集体的未来。

可能性：地理媒介带来的其他选择

针对(或说循着)提出的问题,麦夸尔用多琳·马西^③看待城市的框架来观察媒介技术给城市带来的变化。马西在《城市世界》一书中指出:“城市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城市这种模糊性,这种可能性与问题并存的状态会一直贯穿本书。”稍加改动,媒介技术可能性与问题并存的暧昧同样也贯穿了麦夸尔的《地理媒介》。数字网络技术或可招致的堕落可能仍需由技术来救赎。远程通信技术一方面被学者视为对现代民主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也被视为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民主和平的唯一可能^④。麦夸尔教授就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强调了“媒介”转变为“地理媒介”的过程给城市公共生活带来的多重可能性,并在书中大声疾呼“数字媒介的传播潜力在目前被极大地浪费了”。

数字网络媒介传播方面的潜力集中表现为地理媒介在重造城市公共空

① Koolhaas, Rem, 'My thoughts on the smart city', Talk given at the High Level Group Meeting on Smart Cities, Brussels, 24 Sept. 2014, Transcript a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2010-2014/kroes/en/content/my-thoughts-on-smart-city-rem-koolhaas>.

② Sassen, S., "The global street: Making the political", *Globalization*, 2011, 8(5), pp. 573-579.

③ 多琳·马西、约翰·艾伦·史蒂夫·派尔:《城市世界》,杨聪婷等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 Stiegler, Bernard, "Telecracy against democracy", *Cultural Politics*, 6(2), pp.171-180.

间方面的多重可能性。公共空间是城市中不同个人有限在场之间进行彼此显露的所在。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认为，健康有益的城市公共空间需在市民个人隐私的安全边界和松散的社会接触间达成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持续能促进公共信任的形成^①。而媒介技术迅速以各种新形态（如大屏幕、墙面灯光秀等）嵌入城市已有的地理空间，在由逻辑算法关联起来的地点间重新安置了非具身性的碎片化主体。这种嵌入和安置将媒介技术原本对交往的时空设置叠加糅合到广场、公园、步道等那些本就设定市民聚散流动的时空安排之上。这种叠加混杂是生成性的。地理与媒介的“联姻”改变了城市公共空间中公共交往的形态，创造出身体“集体在场”的新城市体验，也重新划定了个人边界与松散接触间的平衡点。作为后果，公共与私密、中介互动与面对面交往、生人与熟人等城市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范畴随之发生了松动。

与技术（反）乌托邦观点不同，麦夸尔从这种松动中敏感地意识到城市公共空间除了被商业和政治裹挟外，还能成为市民培养和试验新型社会交往技能的场所。地理媒介为市民在城市公共空间中以实验精神积极探索体验新的社会互动形态创造了可能。但仅具备媒介技术条件并不足以实现可能。麦夸尔教授强调，为了培育市民的实验精神，网络化的城市公共空间需充分“留白”。与“智慧城市”的设计理念不同，城市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要对不完整性、市民的自发性和不确定性的涌现作有意的保留和鼓励。按萨森所说，城市要在充分认可“不完整性”本身的价值后，利用设计规划，鼓励居民通过本土实践来将信息传播技术城市化。这种对“不完整性”的保留能有效地包容市民日常交往中的实验性创造，并推动差异化行动主体在参与式公共空间中尝试多样化的合作共处。麦夸尔教授认为，这种对实验精神的包容可以在网络化城市公共空间中培养市民与“地理媒介”技术相匹配的社会技能。不断获取和实践更新的社会交往技能是人们作为“网络化市民”存在并实现自己对城市权利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①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Trade Publishing, 1961.

麦夸尔教授的研究不止步于理论,更实际实施了包括城市广场大屏幕互动、光柱墙面投影和大屏幕跨国舞蹈教学等多场城市公共空间的数字艺术实验。实验从理论上支持了探索性艺术实践对市民探索精神和社会技能培育的促进作用。艺术实践的实验性具身方法通常探讨政治和商业力量鲜有涉足的互动维度,这为城市交往摆脱政治或资本逻辑提供了沃土。开放的艺术实践将城市生活所有交往关系作为审美对象加以重新审视^①。媒介技术、具身行动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体验——打开城市生活的审美维度同时推动了“成为公共”的过程。经由市民的艺术实践,城市本身成了始终“有待完成”的艺术作品。城市中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权威不再仅仅依据植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活形态。权力与社会关系更直接地被转化为具有时间性的“传播”过程。在探索习得新的交往技能过程中,市民们创造出新的关联,打开原本被封闭的通路,并将现实中孤立的层次重又连接起来,化为城市创造力和生命力新的源泉。恢复城市生活的生命力和激情重又成为可能。对此,麦夸尔教授描绘,在松散但充满各种激进不完整性的城市时空中,市民作为生活艺术家栖息(inhabit)其中,积极地实践更为圆满和充满激情的生活。城市生活实践过程中涌现出来那些让人激动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为人们驱散现代城市喧嚣繁忙过后的绝望平庸和无趣提供了不断更新的可能。

《地理媒介》全书架构与可能性的实现

从问题入手到通过实证研究凸显技术和城市“交集”中涌现出的多种可能,麦夸尔教授所著的《地理媒介》一书就如何看待城市与媒介,如何看待数字媒介的暧昧性,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恢复市民与城市之间的多重可能性等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全书既分析阐明了城市传播在数媒时代的变化,更着力通过“地理媒介”的概念颠覆了经典传播理论的预设“再现”理论。

^① Bourriaud, N., *Relational Aesthetics*, trans. S. Pleasance, F. Woods with M. Copeland, Dijon: Les presses du reel, 2002.

这种颠覆体现了作者的尖锐的问题意识、对现有媒介研究理论脉络的深切把握和对技术复杂性的高度敏感。作为从城市新媒体入手反思传播理论和传播研究的新媒体专著，本书为传播学理论的范式创新指明了发展方向。

就整书架构看，《地理媒介》首先解析了从“媒介”到“地理媒介”的转变过程，分析了“地理媒介”的传播特点，以及这种转变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意义。然后，作者开章明义，强调突出了市民对城市的权利、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变迁和智慧城市话语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解。在建构起全书理论分析的框架后，《地理媒介》具体分析了不同的实证案例。第二章“谷歌城市”通过谷歌街景考察城市数字平台的意义。作者将“谷歌街景”视为城市形象中介化的新形态，将其重要性与谷歌整体的商业策略联系起来加以观察。通过将智慧城市的广义逻辑与谷歌街景联系起来，作者提出，数字存档新的操作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人们如何利用社会实践和政治想象来重新定义城市本身。第三章“参与式公共空间”提出人们或可倒转那些利用大规模监视手段的媒体实践。章节开门见山地提出需对当下关于“公共参与”的话语修辞进行批判性分析。该章聚焦公共空间中的数字艺术实践，探索数字网络环境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公共交往形态。通过回顾艺术实践中“情境”观念的发展历史，并将其与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型”关联，作者试图深入理解公共媒体艺术如何促进了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挪用”。第四章“城市屏幕和城市媒介事件”则集中考察了当下城市公共空间中借由公共屏幕技术产生的社会交往。通过对公共空间中不同类型大屏幕的实证研究，作者提出“城市媒介事件”模型。结合第二代城市屏幕在特定情境中的集体互动实践，作者指出，类似实践有潜力创造出新的公民参与模式，并提供独特的跨国沟通经验。整书收尾“重构公共空间”一章致力于总结前文个案分析对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理论意义。作者强调，地理媒介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纽带在当下已成为重新理解媒介技术的关键。通过基于地理媒介技术的城市公共交往，市民或能更好地认识在面对面即时的社会关系中被技术中介化的多重时间性，更确实地接受城市高度的差异性和不断提速的流动性，并以不同方式掌握网络城市中与他者合作共处的社会技能。

从全书架构看，未来的研究似乎应该在技术的多重可能性得到学理脉